

五四新青年群體 為何放棄「自由主義」？ ——重大事件與觀念變遷互動之研究

• 金觀濤、劉青峰

一 從五四運動爆發原因講起

90年代以來，隨着中國知識精英紛紛告別革命，在一般人心目中，五四和新文化運動已成為中國現代激進主義的代名詞。但在五四運動八十五周年的今天，我們仍然認為有重新探討這一命題的必要。一方面這是因為學術界對於如何界定五四運動的性質，一直存在着分歧。另一方面我們認為如果不在該領域引進新研究方法，是不可能真正理解五四在中國現代史上的意義。

在五四運動八十五周年的今天，仍有重新探討這一命題的必要。五四是從啟蒙走向救亡的轉折點，象徵着本來只關心思想啟蒙的知識份子走上街頭過問政治。重新檢討五四運動爆發原因，蘊含着中國知識份子為何放棄自由主義的重大信息。

周策縱在他有關五四運動的奠基性著作中，將其界定為啟蒙思潮和愛國主義結合的產物，五四成為新文化運動的代名詞^①。但早在70年代就有學者指出，無論從參與者還是思想傳承上講，五四運動的爆發和當時啟蒙思潮的關係並不大^②。啟蒙價值(如科學、民主、世界主義)是1915年開始的新文化運動的主調，而觸發五四事件的是愛國主義和反帝(民族主義)，啟蒙和反帝是兩種不同的價值體系。也就是說，五四是從啟蒙走向救亡的轉折點，應該把新文化運動與五四事件明確分別開來。這樣，為甚麼會發生五四事件就具有特殊意義，因為它象徵着本來只關心思想啟蒙的知識份子走上街頭過問政治。正是基於這一重大事件的衝擊，新知識份子的主流放棄了自由主義而親和馬列主義。換言之，重新檢討五四運動爆發原因，蘊含着中國知識份子為何放棄自由主義的重大信息(如果五四知識份子早期所執着的信念真的可以稱為自由主義的話)。本文正是圍繞這一問題，以《新青年》為案例，利用數據庫新方法，探討重大事件與觀念演變之間的互動，力圖在思想史研究領域中引進一新探索。

一般說來，如要探討事件如何影響普遍觀念，首先必須明確界定導致該事件發生的原因是甚麼，然後從複雜的因果關係中闡明普遍觀念變化之邏輯。對五四運動爆發的原因，歷史學家早已作過詳盡的分析。正如呂實強教授所指出的那樣：五四運動爆發實為國人對日本侵略進逼的悲憤，特別和知識份子對巴黎和會的期盼、《凡爾賽和約》帶來的失望有着極大關係^③。將其投射到思想觀念演變領域，似乎強化了所謂救亡壓倒啟蒙的說法：正是巴黎和會這一重大事

件，使中國知識份子認識到，西方民主國家一直是自私自利地根據本國利益行事，他們所謂作為公理的普遍人權和民族自決不過是騙人的鬼話；也由於這種認識，促使中國知識份子放棄了自由主義，轉而親和馬列主義④。

毫無疑問，五四運動的起因是巴黎和會，巴黎和會確實侵犯了中國的權利；但是與十九世紀中期以來西方列強侵犯中國權利的種種不平等條約相比，這次事件並不特別嚴重。那麼為甚麼巴黎和會引起中國知識份子如此強烈的反應呢？從來，人們對某一件事的反應並不是僅僅由事件本身決定，還取決於觀念對事件的解讀。甲午後二十年間，西方列強對中國的侵略之所以不妨礙中國知識份子把西方民主國家作為效法對象，是因為他們以社會達爾文主義為公理。在社會達爾文主義的語境中，公理本來就是物競天擇、弱肉強食的代名詞，它和強權並不對立。從社會達爾文主義看來，巴黎和會的決定並沒有甚麼大不了，弱國本來就無外交，況且它似乎並沒有違背國際法規。只有對甚麼是公理的理解發了某種重大變化，巴黎和會的結果才會成為學生上街抗議以及對自由主義幻滅的原因。

實際上，早在五四運動前一年，即1918年一戰結束協約國取得勝利時，我們已看到知識份子的公理觀發生了某種微妙的變化。陳獨秀這樣論證公理與強權的關係⑤：

自從德國打了敗仗，「公理戰勝強權」這句話幾乎成了人人的口頭禪。……簡單說起來，凡合乎平等自由的，就是公理；倚仗自家強力，侵害他人平等自由的，就是強權。……這「公理戰勝強權」的結果，世界各國的人，都應該明白，無論對內對外，強權是靠不住的，公理是萬萬不能不講的了。

在「公理戰勝強權」的句子中，「公理」成為「強權」的對立物，它完全不同於新文化運動前社會達爾文主義以「物競天擇、適者生存」為內涵的公理觀。也就是說，在1919年之前，「公理」的內容已不再由社會達爾文主義所決定，只有在這樣的思想背景下，新知識份子在聽到《凡爾賽和約》的結果時，才會覺得被西方欺騙了。因此，研究新知識份子告別自由主義的原因，必須去進一步追問他們何時、為甚麼否定社會達爾文主義？人們通常認為，正是第一次世界大戰暴露了建基於社會達爾文主義價值系統的危機：一個只強調個人權利、鼓勵競爭的社會固然可以不斷發展，最後卻導致危及全球的現代民族國家之間的血腥大戰。一旦社會達爾文主義不再代表天道，甚麼是公理也就必須重新定義了。世界大戰這一重大歷史事件，不僅僅通過改變人們的觀念而影響到對《凡爾賽和約》的解釋，而且還作為一種強有力的歷史記憶，進一步衝擊中國知識份子對未來觀念的建構。因此如果我們忽略第一次世界大戰，是不可能對知識份子在1919年的觀念變遷有真正的認識。

上述分析表明，立足於歷史洪流某一時刻橫斷面作深入而細化的研究，是不可能找到該時刻普遍觀念變化的真正原因。如果說五四事件是知識份子放棄自由主義理念的轉折點，要找到新知識份子發起五四抗議的原因，除了研究對巴黎和會的反應外，還必須分析支配參與者的公理觀念。而這種公理觀念的形成則是基於更早的事件的衝擊。換言之，某一事件之所以會改變人們的普遍觀念，這是因為以前發生的歷史事件造就了這一觀念。一旦進入這一思路，分析事件對普遍觀念的衝擊，就變成一連串無窮的追問。研究者將陷入一張不斷擴大的歷史事件與觀念轉變的大網之中。為了研究某一時期普遍觀念變化的原

早在五四運動前一年，知識份子的公理觀發生了某種微妙變化，「公理」成為「強權」的對立物，「公理」的內容已不再由社會達爾文主義所決定，只有在這樣的思想背景下，巴黎和會的結果才會成為學生上街抗議以及對自由主義幻滅的原因。

因，我們不得不將這一因果鏈中所有過去的事件找出來。那麼，是不是過去發生的一切都被包括在這張因果網之內，使得研究者無法着手分析呢？

我們認為，並非所有事件都和普遍觀念變化有關。只有那些和人的價值追求強烈相聯以及和理想社會藍圖有關的事件，才會反反覆覆參與到觀念建構之中。為了研究事件如何影響人們的觀念，我們必須提出一個新概念，這就是觀念史圖像中的事件。它是指該事件的參與者或觀察者在自己觀念圖像中有明確定位的事件。研究事件如何影響觀念，首先必須對歷史事實進行篩選，確定和我們研究對象有關的觀念史圖像中事件的集合。既然觀念史圖像中的事件是指那些在觀念系統中有定位的而且和人們普遍價值系統不可分離的事件，那麼它就有很強的主觀性，這就引出第二個難題：我們又如何客觀地研究它呢？

並非所有事件都和普遍觀念變化有關。只有那些和人的價值追求強烈相聯以及和理想社會藍圖有關的事件，才會反反覆覆參與到觀念建構之中，這就是觀念史圖像中的事件。同一社會事實對於不同的觀念系統，可以是不同的觀念史圖像中的事件。同一群體在不同的時段，對同一事件的看法和觀念也可以有很大差異。

二 甚麼是觀念史圖像中的事件

我們先來回答第一個問題：如何界定觀念史圖像中的事件？早期社會學家如涂爾幹 (Émile Durkheim) 把社會事實 (social fact) 定義為不依賴於任何一個個人對它感知的客觀存在，只有這種如同物一樣的客觀存在，才是社會學研究的對象。這種研究方法曾經是社會學研究的主流。我們提出的觀念史圖像中的事件則不是這樣。簡單來說，觀念史圖像中的事件與一般社會事實有如下區別：

首先，只有當該事件的參與者、觀察者或回憶者的動機跟某種理念有關，而且他們的動機被某種共同觀念所支配時，對於這些參與者、觀察者或回憶者而言，該事件才構成某種觀念史圖像中的事件。而與之並存的當時發生過的大量事件，如天災、交通事故、運動場騷亂、市場物價波動等等，它們通常並不直接參與改變人們的觀念，故大多屬於社會事實而不是觀念史圖像中的事件。

其次，正因為導致普遍觀念改變的不是社會事實本身，而是與該事實相對應的觀念史圖像中的事件，故此同一社會事實對於不同的觀念系統，可以是不同的觀念史圖像中的事件。如朝鮮戰爭爆發是客觀事實，但對於中共、國民黨和美國，同一事件有着不同的含義，它在觀念史圖像中的定位也不同。同一群體在不同的時段，對同一事件的看法和觀念也可以有很大差異。我們不能離開觀念系統來討論觀念史圖像中的事件。

這樣一來，研究事件如何改變(或產生)觀念，我們要處理的就並非簡單的是社會學家所研究的事實，而是觀念史圖像中的事件，它是主客觀交融的產物。更重要的是，客觀事實改變人們的觀念並非如馬克思主義典範所指出的那樣，觀念只是反映事實；觀念史圖像中的事件是指事件與觀念之間的互動，即觀念的改變通常會影響人的社會行動，而新的社會行動又會變成觀念圖像中的事件，它進一步影響到剛形成的觀念系統。對於某一特定的觀念系統(它的產生和衰亡)而言，必定存在着一組觀念史圖像中的事件。我們只能根據觀念系統的結構和變遷的邏輯來界定哪些社會事實是觀念史圖像中的事件。既然很難像歷史研究注重於客觀事實那樣去研究觀念史圖像中的事件，那麼人們必然會質問：如何進行相對客觀的研究呢？

客觀地把握普遍觀念的變化的一個可行辦法，是利用當時最重要的文獻，把表達普遍觀念的關鍵詞作為分析對象和經驗基礎。如果說為了判斷某一普遍

觀念是否真的存在過，必須找到傳播觀念的語言學證據，即觀念的變化一定存在着表達該觀念詞彙或語言意義的變化。我們認為，那些作為觀念史圖像中的事件，一定是在反映觀念變化的歷史文獻中被記錄的事件。記錄得愈詳細、提及次數愈多，表明它同觀念系統的聯繫愈緊密、愈重要。正如對某種普遍觀念存在着相應的關鍵詞一樣，人們也經常對觀念史圖像中的事件進行命名。因此，如果說對那些反映普遍觀念變遷的詞彙的記載頻度和意義的統計分析，是研究觀念變化的客觀方法；那麼我們只要研究該文獻中記錄了哪些事件，特別是統計被歷史命名的事件頻度，分析它和當時普遍觀念變化的關係，也就成為客觀地研究觀念史圖像中事件的方法。自1997年起，我們就開始把數據庫中關鍵詞的統計分析用於思想史研究之中。與前幾篇用關鍵詞統計分析研究普遍觀念變化的論文不同^⑥，本文是側重於分析文獻中對事件的記錄，探討研究觀念史圖像中事件與觀念變遷互動的方法^⑦。學術界通常以新青年群體思想的變遷作為五四新知識份子放棄自由主義的典型，那麼，根據上述必須用反映普遍觀念變遷文本來界定觀念史圖像中的事件這一原則，我們則選擇了《新青年》中被記錄的事件作為研究對象。我們首先建立了《新青年》全文本的數據庫和該文本規範性意義分析的數據庫^⑧，統計該數據庫中提及的主要歷史事件，然後再分析當時人們對事件的評價及其如何與觀念互動，以勾劃事件如何影響觀念變遷的歷史圖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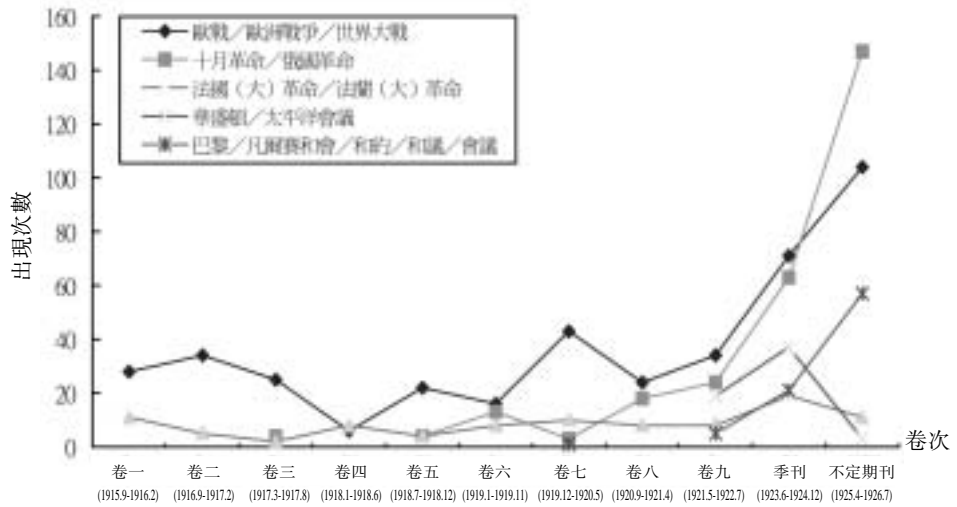
我們利用《新青年》數據庫，把文獻中提及的大小歷史事件(同一事件的不同提法，歸為同一事件)按提及的次數做出統計，得到表1^⑨。一般來說，事件被提及次數愈多，代表當時的人愈關注它。如表1所揭示的那樣，在《新青年》雜誌中「巴黎和會」被提到共84次，如果用被提及次數作為觀念史圖像中的事件重要性之指標，它佔第七位，尚有六大事件的重要性高於它。更重要的是，如果我們進一步統計這些事件在《新青年》各卷提及的次數，可以給出該事件被提及按年代的頻度分布圖。如圖1所示，在1919年這一知識份子思想轉化的關鍵年頭，「巴黎和會」出現頻度相當低；要到1921年以後，也即在新青年群體接受了馬列主義之後，「巴黎和會」才被大量提及。這說明巴黎和會的結果，雖然是誘發五四遊行的直接導火線，但如果從觀念史圖像中的事件來看，它還不能被視為推動知識份子放棄自由主義的最重要事件。巴黎和會的意義，是在中國人接受了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中不斷被加強、深化的。既然我們承認巴黎和會是不可忽略的影響五四知識份子觀念轉化的事件，那麼，必須重視在表1中列出頻度比它

巴黎和會的結果，雖然是誘發五四遊行的直接導火線，但如果從觀念史圖像中的事件來看，它還不能被視為推動知識份子放棄自由主義的最重要事件。巴黎和會的意義，是在中國人接受了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中不斷被加強、深化的。

表1 《新青年》中所提及的十一項大事

1. 歐戰／世界大戰／歐洲戰爭／世界戰爭	407
2. 十月革命(含俄國革命78次)	275
3. 復辟／籌安會／袁世凱稱帝	129
4. 義和團／義和拳／拳匪	124
5. 法國革命／法國大革命／法蘭西革命／法蘭西大革命	94
6. 新村運動／理想／生活／計劃／派	90
7. 巴黎和議／凡爾賽／塞平和大會議	84
8. 華盛頓會議／太平洋會議	59
9. 辛亥革命	41
10. 新文化運動	39
11. 五四運動	36

圖1 「世界大戰」、「俄國革命」、「法國革命」、「華盛頓會議」及「巴黎和會」在《新青年》各卷中的頻度分布



高的六大事件：如，第一次世界大戰(407次)、十月革命(275次)、復辟(129次)、義和團(124次)、法國大革命(94次)、新村運動(90次)，我們認為這七大事件構成了考察新青年群體觀念變化不可忽略的觀念史圖像中的事件集合。

對同一社會事實，自由主義和馬列主義可能有不同的評價，因此當普遍觀念從自由主義轉化為馬列主義時，這一類社會事件必然面臨再評價。在十月革命發生的1917年，知識份子當時對它並不特別關心。五四運動以後，十月革命才在觀念史圖像中被重新定位的。

三 事件在觀念系統轉化中的定位

由於不同的觀念系統所注重的觀念史圖像中的事件並非完全相同，某些馬列主義看重的社會事實，對於自由主義則可能是無關緊要的；而且對同一社會事實，自由主義和馬列主義中可能有不同的評價，因此當普遍觀念從自由主義轉化為馬列主義時，這一類社會事件必然面臨再評價。其後果是相應觀念史圖像中的事件出現頻度和人們對它的價值取向會發生改變。如果某些觀念史圖像中的事件對自由主義和馬列主義同樣重要，那麼當觀念系統轉化時，這類事件的頻度不會有太大變化。有些事件僅僅是觀念系統轉化的觸媒，它對於自由主義和馬列主義都不重要；這一類觀念史圖像中的事件僅僅出現在觀念系統大變革的短暫時刻，事後會消失得無影無蹤。也就是說，根據事件被提及頻度的時間分布並結合各時段對該事件的評價，我們就可以從統計上確定觀念史圖像中的事件和觀念系統轉化的關係。

表1所列《新青年》提及的十一項重要事件，按發生地點又可分為世界事件和國內事件兩大類。我們先分析一下世界事件。一般來講，人們認為「十月革命」使中國知識界轉向以俄為師，走上全面社會革命的道路。但從圖1可見，在十月革命發生的1917年，它被提及的頻度極低，這表明中國知識份子當時對它並不特別關心。對十月革命的注重發生在1919年以後甚至是20年代初，也就是五四運動以後。我們後面將會分析，十月革命是革命話語勃興之後，才在觀念史圖像中被重新定位的。因此，不能如以往那樣簡單地說「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中國帶來了馬克思主義」，實際上是中國知識份子在認同了社會革命甚至是接受了馬克思主義的過程中，才對十月革命愈來愈有興趣。當然，這並不是說十月革命對中國知

識份子接受馬列主義並不重要，而是強調應該對十月革命這一觀念史圖像中的事件給出更準確的定位，這就是中國知識份子在接受(或部分接受)馬克思主義後，十月革命對中國現代觀念系統轉化的功能主要表現在它作為社會革命成功的樣板，促使列寧主義在中國的傳播和形成中國式的馬列意識形態體系。

那麼，法國大革命對觀念系統的衝擊又如何呢？圖1中「法國大革命」1915-22年間出現頻度一直變化不大，到1922年略有升高，1923年後又降至原有水平。也說是說，在整個新文化運動期間，新青年群體不論是以前認同自由主義還是以後接受馬列主義，他們對法國大革命的重視程度一直變化不大。這樣，某些學者提出的因推崇法國大革命而導致新文化運動後期激進主義興起的觀點，就顯得相當粗疏了。準確的講，法國大革命是在新文化運動一開始(甚至可以說是自戊戌以後)就被重視。在探討法國大革命對中國近現代思想的影響時，我們必須放寬歷史視野，追溯到新文化運動之前，應該把新文化運動思想作為一個整體，考察以法國大革命所代表的現代革命觀念為何會在1915年後興起，使得新文化運動思想和以前不同。

表1所列事件中，頻度最高、變化最大的是第一次世界大戰，因此，我們認為它是《新青年》雜誌觀念史圖像中最重要的事件。圖1顯示，其分布曲線有四個高峰，第一個是1916年，這時一戰正在進行中；第二個高峰是1918年，協約國獲勝，歐戰結束；第三個高峰為1920年，正值五四運動之後；第四個高峰為1923年後，這時中共已經成立，《新青年》已成為中共的機關刊物。分析這四個高峰時期對一戰的評價，可以發現存在着極大差異。1916年對世界大戰的描述和報導大多屬於中性，如高語罕在1916年談到，「現在國家在國際間之位置」，因為「輪軌發軔，交通頻繁」，造成「國際糾紛，與日俱進」，並不一定視協約國為正義，德國為邪惡；他憂慮的是「歐戰初起，波及亞東，東鄰乘隙，要索忽來」^⑩，也就是說關心一戰造成西方列強均勢破壞對中國的影響。

到1918年一戰結束時，協約國明顯已作為正義的一方，如我們在本文開始時引用陳獨秀的言論，明確指出德國戰敗意味着「公理戰勝強權」。高一涵則更為樂觀，他「徵之於最近西人輿論而可信者」，居然相信：「於是信賴民族競爭之小國家主義者又一變而神想乎人道和平之世界國家主義。歐戰告終，國際間必發生一種類似世界國家之組織，以衝破民族國家主義之範圍。」^⑪

但到1920年，高一涵完全改變了前幾年對協約國勝利可以為世界帶來人道和平的國家主義看法，他對歐戰的評價發生了大變化，他說：「到了歐戰一開……全世界的人都一個個極力發揮他的獸性，就是生平以闡明真理自命的人，和世間尊重的哲學家思想家科學家和那些講人道博愛的宗教家，都沒有一個不為自己國家曲辯，不說人家國家的壞話。」^⑫流露出對以真理自命的人的極大失望。到1923年，新青年群體則從馬列主義觀點看歐戰，從經濟決定論和階級鬥爭觀點分析歐戰對世界和中國的影響，它不僅是帝國主義之間邪惡的戰爭，而且還用對歐戰的態度來區分正確與錯誤，甚至屬於資產階級還是無產階級的劃界。

由上述分析和統計可以看到，「世界大戰」的確是當時觀念史圖像中最重要的事件。隨着一戰的發生、進行和結束，《新青年》記錄了其作者群對這一事件不斷反思、評價變化的軌跡。圖1中「世界大戰」對應的1918年、1919年和1920-21年幾個高峰，再查看相關例句(篇幅所限，未能列出例句分析表)對其作出的不同評價，正好反映了《新青年》群體思想演變的幾次轉折。

第一次世界大戰是《新青年》雜誌觀念史圖像中最重要的事件。1916年對一戰的描述和報導大多屬於中性，到1918年一戰結束時，協約國明顯已作為正義的一方。但到1920年，新青年群體認識西方標榜普遍價值時的虛偽性，流露出對以真理自命的人的極大失望。到1923年，他們則從經濟決定論和階級鬥爭觀點分析歐戰對世界和中國的影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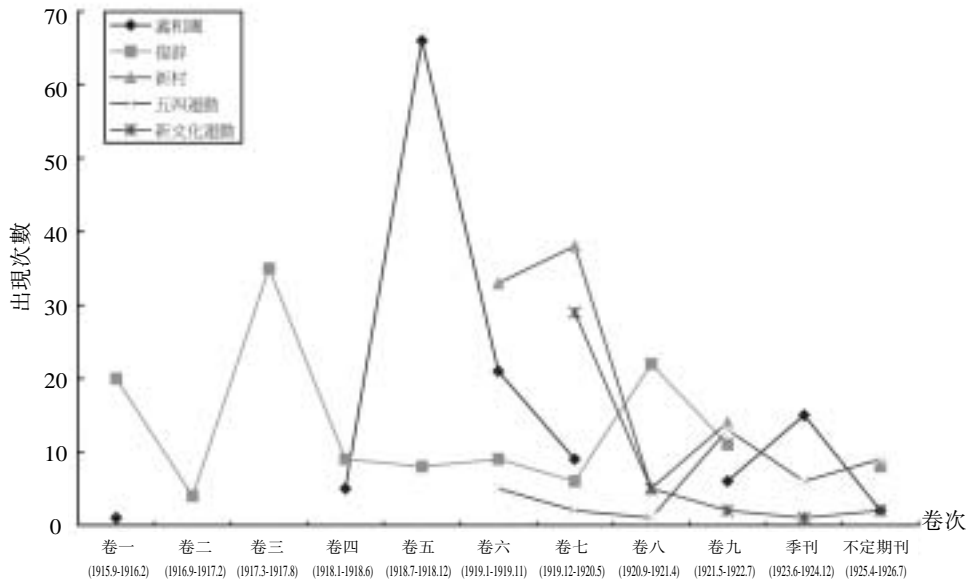
四 重大歷史事件與觀念的互動

在第一節中，我們曾簡單提到第一次世界大戰是五四時期中國知識份子否定社會達爾文主義的原因，統計分析使我們看到這一觀點並不準確。準確的講，中國知識份子否定社會達爾文主義的思潮，是在一戰爆發之後不斷反思的結果。這表明分析人們否定社會達爾文主義，除了一戰外，還必須涉及其他觀念史圖像中的事件，也就是當時發生在國內的事件。圖2為1915-26年間，《新青年》中被記載的最重要國內事件的按年代頻度統計。五四運動前，提及最多的只有復辟和義和團這兩個大事件。特別是復辟，五四前它有兩個高峰。1915年袁世凱稱帝在《新青年》第一卷也即事發時就引起強烈關注，但是在1917-18年間，「復辟」被提及的次數更多。這表明1917年張勳帶兩萬辦子軍進京復辟帝制，對知識份子思想造成更大的震撼。值得注意的是，對復辟的關注一直持續到1922年，其中1920-21年再達到高峰。也就是說，復辟事件一再在觀念系統轉化時期被反反覆覆提及，可見它對知識份子思想衝擊是多麼持久。

袁世凱復辟帝制是中國引進類似於西方共和體制失敗的象徵，張勳復辟則更加深了學習共和制失敗的挫折感，由此引發了中國現代政治思想用「民主」取代「共和」的過程。這反映了《新青年》知識群體對西方現代政治制度背後價值認識的巨變。

再分析各時段對復辟的評價，可以看到新青年群體對其持一貫的否定態度，而且他們除關注復辟事件外，還進一步尋找復辟的社會及思想基礎。在五四時期觀念系統的轉化過程中，如果說歐戰暴露了建基於社會達爾文主義之上國際秩序的虛妄，那麼，袁、張相繼復辟帝制事件則導致新知識份子懷疑民初引進的共和政治。我們曾經論證過，袁世凱復辟帝制是中國引進類似於西方共和體制失敗的象徵，它成為新文化運動爆發的直接誘因。1917年張勳復辟更加深了學習共和制失敗的挫折感，由此引發了中國現代政治思想用「民主」取代「共和」的過程^⑩。這不僅是對西方現代政治制度指稱的變化，還反映了《新青年》知識群體對西方現代政治制度背後價值認識的巨變。以陳獨秀、吳虞等人為代表，新青年群體認為儒家倫理應為復辟負責，猛烈批判在二十世紀頭十年中那種把私領域道德和公共領域道德視為互不相干的二元論觀點，由此發起新文化運動。除了儒家倫理外，社會達爾文主義也是虛君共和的政治保守主義主張的理論根據：鑑於國情，中國要穩定圖強、趕上西方，求發展求生存，就必須恢復帝制。到1918年，新青年群體對民初政治的失望、對復辟的批判，與對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反思結合起來，從此，社會達爾文主義迅速喪失其在中國思想界的霸主地位，成為批判對象。

那麼，義和團事件在觀念系統轉化中又起了甚麼作用呢？圖2顯示，它在1918年達到高峰後急驟遞減，1920年一度消失，到1921年後才被重提。應該說，在新文化運動時期，義和團事件只是一種歷史記憶。從文本上看，1918年陳獨秀重提義和團，是有關慶祝協約國勝利時看到克林德碑的報導，勾起往日的回憶。他引用羅惇融的文章，先講「義和團既藉仇教為名，指光緒帝為教主，蓋指戊戌變法，效法外洋，為帝之大罪也」，揭示出義和團是中國回應西方衝擊時反西方的意義，而後說「義和團自謂能祝槍炮不發，又能入空中指畫則火起，刀槊不能傷；出則命市向東南拜」^⑪，是中國傳統文化落後愚昧的象徵。實際上，當時大多數有關義和團的議論，都有上述代表性言論的兩個要點。我們可以看到，在1918年對義和團的反思中，它與反對復辟一起如何激起全盤反傳統主義。圖2表明，義和團事件到1921-24年又再次被提及，時間正好與另外一件今日差不多已無人知曉的事件——華盛頓會議大致相同。這時，《新青年》知識群體已經

圖2 「義和團」、「復辟」、「新村」、「五四運動」和
「新文化運動」在《新青年》各卷中頻度分布

接受了馬列主義。巴黎和會與華盛頓會議都被定性為帝國主義的分贓，在這種視野下，已看不到對義和團排外和愚昧的批評，代之而起的是把義和團視為中國人民自發反抗帝國主義侵略的鬥爭。

現在，我們可以來分析五四運動和新知識份子思想轉向的關係了。如前分析，在討論二十世紀中國的社會達爾文主義思潮時，歐戰和復辟無疑是引致新知識體群觀念轉變的最主要的觀念史圖像中的事件；新知識群體對西方列強認識的觀念轉變，又促使他們對巴黎和會的結果作出5月4日那一天走向天安門廣場抗議的行動。在一系列觀念史圖像中的事件與觀念轉化的過程中，特別是在激烈的政治變動中，五四運動自身也立即變成觀念史圖像中的重大事件，馬上被賦予意義。一般說來社會事實轉化為觀念史圖像中的事件是需要經過一段時間，但「五四運動」這個詞卻幾乎是立即被使用的。1919年5月20日《晨報》就將5月4日發生的事件稱為「五四運動」，並認為它是「再造中國之元素」。人們讚揚五四學運，是因為被學生運動和群眾運動這些改造中國的力量所震撼。

五四運動最重要的直接結果，是全國學生聯合會應運而生。6月16日全國學聯在上海先施公司東亞酒樓召開會議。一下子，全國的學生組織起來了，中國出現了一支史無前例的社會改造力量。1919年10月國民黨人張煊給當時的粵軍總司令陳炯明信中寫到：「觀於北京大學數月來之舉動，我西南數十萬雄兵所不能為者，而彼能為之。」^⑨學生比兵還厲害，被冠以「丘九」的稱號。李劍農也認為：「有了長久歷史的國民黨的組織和黨員間的聯絡指揮，恐怕還不如這個新成立的全國學生聯合會組織的完密，運用的活潑靈敏。」^⑩中國頓時成為「學生運動的中國」。學生甚至被稱為學匪，市民一聽到「鬧學生」，都視為「拳變」再現，奔走相告，避之唯恐不及。當時有這樣一種說法，學生由於整天在街上鬧事，被稱為「滿口新名詞，胸無點墨」。正如羅家倫所言，當時有一種「學生萬能」的觀念，學生界奇軍突起，彷彿成為一個特殊階級，這個階級似乎甚麼都要過問^⑪。

五四運動自身立即變成觀念史圖像中的重大事件，馬上被賦予意義，被認為是「再造中國之元素」。五四運動最重要的直接結果，是全國的學生組織起來了，中國出現了一支史無前例的社會改造力量。

必須強調的是，作為觀念史圖像中事件的五四運動，對觀念系統轉化的衝擊長期被忽略。在此之前知識份子深陷於共和政治失敗和改造社會的無力感之中，而學運一發生，它的意義立刻被認識到了。正如羅家倫所說¹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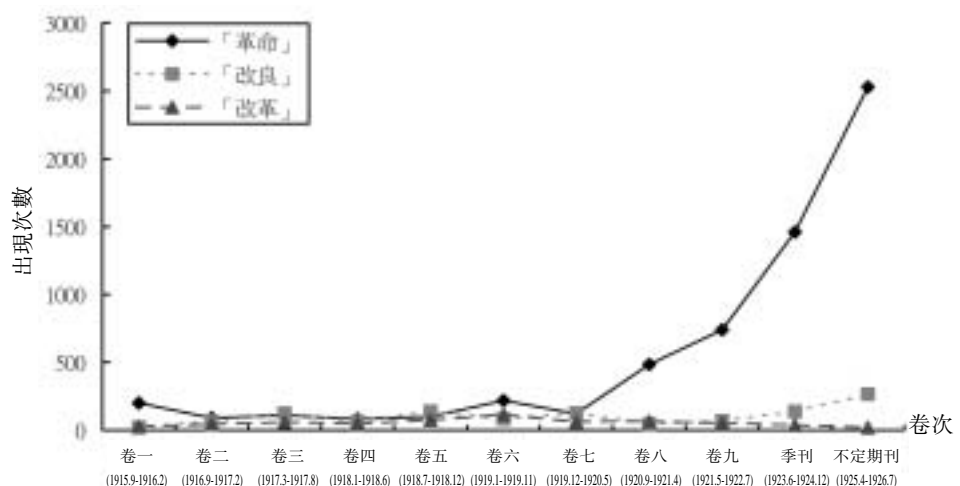
五四以前中國的社會可以說是一點沒有組織。從前這個學校的學生和那個學校的學生是一點沒有聯絡的，所有的不過是無聊的校友會，部落的同鄉會，現在居然各縣各省的學生都有聯合會……。「五四運動」的功勞就在使中國「動」！

換言之，對於所有知識份子，這一觀念史圖像中的事件都指向同一方向，這就是告別文化運動，走向政治參與。從五四運動本身的演化邏輯可以看出：一開始學生的口號是「只問外交、不問內政」，過不了幾個月，全國學運則以「外爭國權、內懲國賊」和「打倒軍閥、再造中國」為目標了。分析圖2「五四運動」和「新文化運動」被提及的頻度分布及意義，後者主要集中在1919-20年，是《新青年》作者群在反駁新文化批判者時所用；而「五四運動」則自1919年事件發生後不斷被提及，並十分清楚地將五四運動和新文化運動區別開來。

五四運動激起的政治參與意識高漲，其直接後果是革命觀念的勃興。圖3是《新青年》中「革命」及「改革」等關鍵詞的頻度分布。從中可見，直至1919年以前，「革命」使用的頻度一直相當少；正是五四以後，它以井噴之勢興起。它表明1913年二次革命失敗後知識份子告別革命情緒之逆轉，是自清朝實行預備立憲後沉寂了十幾年的革命話語的復活。我們曾經論證過，「革命」在中國傳統政治文化中是指改朝換代，它是在改革失敗、清王朝統治合法性喪失時出現，並獲得西方revolution觀念中進步和徹底改變的意義¹⁹。1919年以後革命話語勃興，是五四知識份子對共和主義改革的絕望，也是他們意識到學運和群眾運動的結合可以成為改造中國力量的表徵。1919年12月，陳獨秀就很清楚地道明這一意義²⁰：

軍人官僚政客是中國的三害……自從五四運動以來，我們中國一線光明的希望，就是許多明白有良心的人，想衝出這三害的重圍，另造一種新世界；這新世界的指南針，就是喚醒老百姓，都提起腳來同走「實行民治」這一條道路。

圖3 「革命」、「改良」、「改革」在《新青年》各卷頻度統計



對於所有知識份子，作為觀念史圖像中事件的五四運動都指向同一方向，這就是告別文化運動，走向政治參與。其直接後果是革命觀念的勃興，這代表五四知識份子對共和主義改革的絕望，也是他們意識到學運和群眾運動的結合可以成為改造中國力量的表徵。

五 宏觀結構在歷史研究中的意義

從圖2可以看到，1919年還有一件幾乎與「五四運動」同時、但比它更多被討論的事件，這就是「新村運動」。如果說一戰暴露了資本主義全球化的弊病，那麼新村運動則以烏托邦的失敗，把五四運動革命動員推向接受列寧主義。

新村運動在1919年迅速興起，是五四運動激起參與熱忱的另一種社會行動。當時周恩來在天津辦覺悟社，要尋找「人」的生活^㉑，把改造家庭、共同生活、工讀主義作為經常討論的題目^㉒。毛澤東計劃在嶽麓山下建立半耕半讀的新村^㉓。恽代英在武昌創辦利群書社，計劃建立一個完全共產的「共同生活的模型」，並稱之為「未來之夢」^㉔。工讀互助團遍及北京、上海、武昌、南京、天津、廣州、揚州等地^㉕。新村運動和工讀互助團試圖以個人組織新生活模式來影響社會。但這種訴諸個人自願的社會改良嘗試，很快就由於無法在經濟上維持而逐個宣告破產。1920年12月，陳獨秀已經用唯物主義觀點來總結新村運動的失敗，他指出，自人類有社會以來，「試問物質上精神上哪一點不是社會底產物？哪一點是純粹的個人的？」因為沒有認識到這一點，「福利耶以來之新村運動及中國工讀互助團便因此失敗了」^㉖。1921年，陳獨秀道：「前代的隱者，現代的新村運動及暗殺，都是個人主義教育結果底表現。」而新村運動者「想除去社會上惡的一部分好達到改良社會底目的，其實都是妄想」；他說：「要想改革社會，非從社會一般制度上着想不可。」^㉗可見，新村運動失敗對知識份子觀念系統的衝擊，乃是否定其個人主義以及那種自我改良式的社會再造夢想。

新村運動的失敗，使《新青年》群體認識到必須用社會革命取代社會改良，而要取得社會革命的成功，就必須改造原有鬆散的政黨及動員群眾的方式^㉘，組織列寧主義政黨，發動社會革命，徹底改造中國。事實上，正是由於對五四運動意義的認識和理解不斷強化、深入，1921-24年，在由工讀互助團演化而成的赴歐勤工儉學的學生組織中，出現了最早的中共支部。中共的成立又大大加強了十月革命和馬列主義在人們心目中的分量。這也就是我們前面提到的在1917年十月革命爆發時，《新青年》中對此事提及得並不多，只有到中共建黨、1922年以後，「十月革命」才成為這一知識群體熱切關注的焦點。在《新青年》中，提及「辛亥革命」和「俄國二月革命」的頻度幾乎是同步的；而且，它們都被視為不徹底的革命，未完成的使命應該由被即將來臨的徹底革命來實現，正如二月革命後發生十月革命那樣。五四新青年群體選擇共產革命，則意味着放棄自由主義，轉變為馬列主義的信仰和實踐者。

以上，我們通過分析《新青年》提及的一系列國際和國內重大事件是怎樣與五四新青年群體的觀念互動過程，勾勒出他們從五四運動發起者到中共建黨者、從自由主義的信奉者到馬列主義的實踐者的轉變。根據我們的分析，五四新青年群體放棄自由主義，與他們對自由主義國際秩序的幻滅、中國學習西方共和政治的失敗，以及對學生運動改造中國的期望都有直接關係。但是，如果我們把新文化運動作為一個整體來看，本文一開始提出的「五四新青年群體為何放棄自由主義」這個問題本身是否有意義也就很值得懷疑了。因為，十九世紀的自由主義一直是同社會達爾文主義緊密相聯的。如果我們的量化分析成立，早在五四運動爆發前一年，新青年知識群體已否定社會達爾文主義和共和政治，如果用這一時期的思想來代表新文化運動提倡的啟蒙價值，它是自由主義嗎？

五四新青年群體放棄自由主義，與他們對自由主義國際秩序的幻滅、中國學習西方共和政治的失敗，以及對學生運動改造中國的期望都有直接關係。但是，如果我們把新文化運動作為一個整體來看，「五四新青年群體為何放棄自由主義」這個問題本身是否有意義也就很值得懷疑了。

要真正理解新文化運動時期的思想變化，我們必須把新文化運動放到人類近現代社會變遷和中國近現代史甚至是幾千年的王朝更替中，才能對其有深入理解。觀念史圖像中的事件不僅包含着社會事件和觀念變遷互動的記錄，還是歷史變遷長程模式研究的最重要根據，注重社會思想和社會事實在互動中演化的機制。

當時知識份子對西方社會雖尚未幻滅，但他們的理想已超出西方社會本身。因此新文化運動是用大無畏的理性精神審視一切生活領域，這種精神也包含着對自由主義的反思，那麼，是否可以用信奉自由主義來概括五四前《新青年》的思想主流呢？此外，如果說馬克思主義在西方的興起，是源於十九世紀經濟自由主義支配下全球化帶來的危機，而列寧主義本質上可歸為俄國現代化過程中社會整合解體的產物，那麼，新文化運動倡導的啟蒙價值的本質又是甚麼呢？我們之所以在本文結束前要對中心論題提出懷疑，是因為感到，時至二十一世紀初，我們並沒有真正理解影響整個二十世紀中國的新文化運動。

自90年代開始，中國史學界一反80年代注重思想和宏觀研究的學風，沉入愈來愈瑣碎的細節考證之中。歷史研究的細化無疑有益於學術研究的進步，但是本案例研究表明，要真正理解新文化運動時期的思想變化，我們必須拓展自己的視野，把新文化運動放到人類近現代社會變遷和中國近現代史甚至是幾千年的王朝更替中，才能對其有深入理解。五四學生運動喚醒了原本代表王朝更替的「革命」，賦與它現代含義，並使新知識份子意識到自己可以用革命的方式建立新社會，克服中國在現代化進程中發生的社會整合危機。如果我們不把新文化運動時期的思想變遷和它之前與之後的歷史整合起來，不把中國近現代思想和世界歷史整合起來，就不可能理解五四時期的思想轉化。

布羅岱爾 (Fernand Braudel) 在他的經濟史巨著中提出了長時段的概念，但在觀念史研究中，人們由於找不到類似於地理結構、經濟發展長周期那樣可以長程影響觀念變化的因素，故一直缺乏對長時段變遷模式的興趣。我們在本文中所做的嘗試表明，觀念史圖像中的事件往往只是在觀念系統轉化中被重視、記錄和反覆提及，因此由觀念史圖像中的事件構成的歷史，組成了觀念系統演化的歷史記憶。觀念史圖像中的事件不僅包含着社會事件和觀念變遷互動的記錄，還是歷史變遷長程模式研究的最重要根據。社會事實通過觀念史圖像中的事件為中介與普遍觀念互動的機制，或許可以使我們把馬克思典範和韋伯 (Max Weber) 典範結合起來，提出社會思想和社會事實在互動中演化的新模式。

註釋

- ① 周策縱著，陳永明等譯：《五四運動史》，上冊（台北：桂冠圖書股份有限公司，1989），頁1-9。
- ② Joseph T. Chen, "The May Fourth Movement Redefined", *Modern Asian Studies* 4, no. 1 (January 1970): 63-81.
- ③ 呂實強：〈巴黎和會衝擊下國人的反應(1919)——兼論五四運動的本質〉，載張啟雄主編：《二十世紀的中國與世界論文選集》，上冊（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1），頁457-97。
- ④ 這方面最早的論述可見：Benjamin I. Schwartz, *Chinese Communism and the Rise of Mao*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2), 7-27。
- ⑤ 陳獨秀：〈每周評論發刊詞〉，《每周評論》，1918年12月22日。
- ⑥ 金觀濤、劉青峰：〈近代中國「權利」觀念的意義演變——從晚清到《新青年》〉，《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32期（台北，1999），頁209-60；金觀濤、劉青峰：〈從「群」到「社會」、「社會主義」——中國近代公共領域變遷的思想史研究〉，《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35期（台北，2001），頁1-66；金觀濤、劉青峰：〈天理、公理和真理——中國文化「合理性」論證以及「正當性」標準的思想史研究〉，《中國文化研究所學報》，新第十期（香港，2001），頁423-62；金觀濤、劉青峰：〈從「經世」到「經濟」——社會組織原則變化的思想史研究〉，《台大歷史學報》，第32期（台北，2003），頁139-89。

⑦ 有關規範性意義分析，可參見：金觀濤、劉青峰、章清：〈中國現代政治觀念形成的計量研究〉，《近代中國史研究通訊》，第28期（台北，1999），頁77-99。

⑧ 我們自1997年以來推行的一系列研究計劃如下：香港研究資助局(RGC)資助的“A Quantitative Study of the Formation of Certain Modern Chinese Political Concepts (CUHK4001/97H)”；2002年9月開始香港研究資助局資助的新研究計劃“A Quantitative Study of China’s Selective Absorption of Modern Western Ideas and the Origins of Certain Key Concepts (1840-1915) (CUHK4006/02H)”；特別是2002年4月香港中文大學資助的“Data Mining of the Quantitative Database of La Jeunesse: Research of the Interactions between the Changes in Political Concepts and Important Incidents during the New Culture Movement”，我們完善了《新青年》數據庫，本文寫作即以此數據庫為基礎。在此，我們對以上資助機構和參與數據整理的黃庭鈺小姐致以謝意。

⑨ 除了表1中提及的事件外，按提及多寡還有如下事件：童工、二月革命、日俄戰爭談判媾和密約、實業／工業革命／革新、文藝復興、宗教改革／革命、普法戰爭／之戰、憲法草案(含天壇憲法)、農奴解放、女權運動／女子革命／婦女革命、護國軍、十字軍、癸丑之役／革命／政變、戊戌政變／變法／變法維新、罷黜百家、日本／明治維新、中日戰爭／甲午敗／甲午之役／馬關條約、日皇加冕、馬賽大會、俄土戰爭、匈牙利革命、海牙會議、柔魯會議、共產國際大會、禁酒運動、北美／美洲獨立、英國革命；偶爾提及的有：護法之戰、遠東會議、斯托克霍摩會議、錫黑暴動、三教之爭、湯武革命、田地運動等。

⑩ 高語罕：〈青年與國家之前途〉，《新青年》，第一卷第五號(1916年1月)。

⑪ 高一涵：〈近世三大政治思想之變遷〉，《新青年》，第四卷第一號(1918年1月)。蔡元培講得更清楚：「此次世界大戰，協商國竟得最後勝利，可以消滅種種黑暗的主義、發展種種光明的主義、可見此次戰爭的價值了。但是我們四萬萬同胞直接加入的、除了在法國的十五萬華工、還有甚麼人！」(蔡元培：〈關於歐戰的演說三篇：(二)勞工神聖！〉，《新青年》，第五卷第五號[1918年10月])。

⑫ 高一涵：〈羅素的社會哲學〉，《新青年》，第七卷第五號(1920年4月)。

⑬ Jin Guantao and Liu Qingfeng, “From ‘Republicanism’ to ‘Democracy’: China’s Selective Adoption and Reconstruction of Modern Western Political Concepts (1840-1924)” (未刊)。

⑭ 陳獨秀：〈克林德碑〉，《新青年》，第五卷第五號(1918年10月)。

⑮ 轉引自呂芳上：《革命之再起——中國國民黨改組前對新思潮的回應》(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9)，頁414。

⑯ 李劍農：《中國近百年政治史》，下冊(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74)，頁607。

⑰⑱ 羅家倫：〈一年來我們學生運動的成功失敗和將來應取的方針〉，《新潮》，第二卷第四號(1920年5月)。

⑲ 金觀濤：〈觀念起源的猜想與證明——兼評《「革命」的現代性——中國革命話語考論》〉，《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四十二期(2003年12月)，頁125-40。

⑳ 陳獨秀：〈實行民治的基礎〉，《新青年》，第七卷第一號(1919年12月)。

㉑ 〓《覺悟》的宣言〓，《覺悟》，第一期(1920年1月)，頁1-2。

㉒ 二八：〈三個半月的「覺悟」社〉，《覺悟》，第一期(1920年1月)，頁12。

㉓ 彭明：《五四運動史》(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頁509-10。

㉔ 代英：〈未來之夢〉，《互助》，第一期(1920年10月)。

㉕ 張允侯等：《五四時期的社團》(二)(北京：三聯書店，1979)，頁361-496。

㉖ 獨秀：〈隨感錄(一〇〇)：虛無的個人主義及任自然主義〉，《新青年》，第八卷第四號(1920年12月)。

㉗ 陳獨秀：〈新教育是甚麼？〉，《新青年》，第八卷第六號(1921年4月)。

㉘ 例如可以看到這樣的論述：「直到五四運動之後，國民黨才漸漸接近民眾，接近那真正要自由的學生會，真正要平等的海員工會等等。國民黨到現今方才開始走上民主主義的路，漸漸想代表平民群眾而抗爭，行真革命；以前是浪漫的革命的政黨，首領制個人主義的義俠策略——哥老同盟會的祖傳，如此而已。現今國民黨所以能有如此的大概的傾向，也只是因為社會中實際上有了學生工人商民等的運動，——『社會的物質』已經稍有端倪。」(屈維它：〈自民主主義至社會主義〉，《新青年》(季刊)，第二號[1923年12月])。